

王汎森 著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陈平原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汎森 著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陈平原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王汎森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309-07404-8

I. 近… II. 王… III. 史学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K0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4036号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三联人文书系”之一种,以书名《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出版,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王汎森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 军 盛 亮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40 千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04-8/K·291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本丛书原为陈平原先生应香港三联之约编就，并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反响颇佳。因为发行等方面的限制，丛书少为大陆读者所见，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蒙香港三联授权，我社今特推出简体字版，但愿对大陆读书界是一种补偿。

陈平原先生曾为本丛书香港三联版撰有总序，略述丛书的编选宗旨和出版的因缘际会，无不精妙绝伦，现移用原序中若干隽语，以为简体版弁言，希望于读者诸君有所助益。

“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著’不同”，陈平原先生坦言：“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工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关于该丛书的编选，作为主编的陈平原先生认为，“与



其兴师动众，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英雄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若天遂人愿，旧雨新知不断加盟，衣食父母继续捧场，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图景’会日渐完善”。

关于丛书的编选宗旨，陈平原先生有三点说明：“第一，作者不限东西南北，只求以汉语写作；第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目前仅限于人文学；第三，不敢有年龄歧视，但以中年为主——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历史原因，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

于今，陈先生的宏愿，经由我们的“加盟”和大陆读者的捧场，可以说已部分得以实现；无论如何，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点传薪的工作，也是复旦出版人的志趣所在。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

序



我一向关心近代史学史方面的问题，但是从未有写成专书的计划，而是以有什么就写什么的方式，希望最后能累积成一本集子，题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在我原先的构想中，除了以前发表而未收入本书的几篇之外，至少还有一些正在构思的文章（譬如刘咸忻的史学）。但是因为平原兄最近积极催促我整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小书加入“三联人文书系”，所以进一步的增添必须俟诸他日了。

本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

在将近三十年中，史学的意义、题目、史料、方法、概念、词汇、评价、叙事架构等都起了重大的变化，以至于要想回过头去用传统方式写史，几乎不可能。譬如在近代以前，人们多用“史”而罕用“历史”，近代则用“历史”而少用“史”。由“史”到“历史”，在隐微之间有某种深刻的改变，这一类改变在近代的史学实践中可谓不胜枚举。收在本书中的五篇文章，对前述变化有若干讨论，此处不一一介绍。

在这篇短序中，我倒是想记录我在思考近代史家与史学时的一些想法。

第一，史学活动是整个社会活动中的一环，所以史学必定与整个社会密切互动，尤其是在剧烈变动的时代。因此史学变化的理路，许多应当从史学内部的发展去了解，

但也有很多时候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在史学之外，譬如思潮、政治、社会、认同等，不能忽略。

第二，史学知识或历史记忆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对整个社会都有意义，对所有的行为也都可能产生微妙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问：在每一个时代，史学知识或历史记忆扮演何种社会角色？产生何种社会功能？

第三，在思考史学知识或历史记忆的社会性时，我们会发现一个社会中存在各种不同层次的历史知识或历史记忆，不同层次的历史知识或历史记忆与不同的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各种历史知识或历史记忆系统之间未必截然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往往有出入，因此，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社会中多元历史知识的轮廓，并且留心各种历史知识或历史记忆之间，自觉或不自觉的竞合关系。在一个社会中，因为存在着互有出入的历史版本，或是对某段历史选择性的关心或忽略，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取向、政治抉择、政治认同等，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四，各种历史知识的生产、流通过程，人们获得这些知识的方式，通俗的历史知识与学院研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近来我注意到，近代中国重要的史家、历史著作、史学流派，或历史机构，几乎都有人研究了，以至于许多人感到好像在这个领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着手之处。可是，如果我们把视界放宽到整个时代的历史意识，及它们与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则有一个相当广阔的园地摆在眼前¹。

2008年6月

1. 我最近在一篇题为《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记忆》的文字中，曾对以上若干论点有粗浅的铺陈，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该文刊于《思想》季刊第九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

目录



序 / 1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 1

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

——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 / 29

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

——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 / 69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 103

钱穆与民国学风 / 141

作者简介 / 185

著述年表 / 186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晚清的政治概念 与“新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革命，三次的内容都非常繁复，不过也可以找出几个重心。第一次史学革命是以梁启超（1873—1929）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革命是以胡适（1891—1962）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1896—1950）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开展的事业为主，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第三次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第一次史学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人们反复争论中国究竟“有史”还是“无史”。

读者们一定感到讶异：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献发达，而历史编纂传统又如此丰富的国家，何以在世纪之交突然出现措辞这么激烈的论争？在“有史”或“无史”的争论中，梁启超等人宣称中国“无史”，但是也有人出面坚持中国“有史”，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马叙伦（1884—1970）的《中国无史辩》¹。坚持中国“有史”的一派强调中国史学编纂传统源远流长，宣称中国没有历史的这一边则认为传统史学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这一波论争促使人们反省“什么是历史”，发动这一场论争的梁启超在1902年写了几篇文章，并在其中提出了四个概念，追随的人们便以旧史中是否含有这四种概念所指涉的历史来决定“有史”或“无史”。

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

¹ 刊载在《新世界学报》第5、9两期（1902年10月31日及12月30日）。此外，在《国粹学报》中也零星出现过一些虽然不如马氏口气那样尖锐，但明显的是要证明传统中国不是“无史”，而清统治下确为“无史”的论述。

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新史学的里程碑，几乎出现在所有近代中国史学史的著作中；而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片段，历史学者通常也熟读成诵，尤其是《新史学》，受到当时日本非常流行的“文明史”影响，责备旧史家只是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人的历史，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照理已经不会有太多的剩义可供探讨了。不过，一般多专就史学内部的观点来谈这两篇文字，不曾从晚清以来政治概念与政治词汇的角度来谈它们。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晚清的政治思想如何促动这场史学革命。我们如果打开《新史学》，会发现梁氏所重视的是“国家”、“国民”、“群”、“社会”的历史，这四个词汇在传统中国极少出现，即使出现，也不是近代人所了解的意思。就以“国民”一词来说，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册“本馆论说”中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便表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¹至于其他的词汇，像“社会”、像“群”等，也无不如此。换句话说，《新史学》中有几个最关键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是过去所不曾出现的。如果晚清思想界没有这些“概念工具”，则一篇近代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势必不会以这样的面目出现。本文便是想讨论上面三个在晚清政治思想界甚嚣尘上的“概念工具”如何塑造史学革命。

由于“国家”、“国民”、“群”是晚清时期三个新概念，所以下我要花费比较长的篇幅，讨论这三个概念在晚清思想世界中的形成与衍化过程。晚清政治思想中对政治、国家、国民、社会等问题逐渐形成新的思维，它们与现代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有关。在当时内外环境

1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台北中华书局，1960年，第56页。梁启超并未留意到古代已有“国民”一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汉籍文献资料库”可以从二十五史中查到四十三条“国民”，不过它们不是现代意义的“国民”。



迫压之下，人们开始觉悟到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才能保国救国。人们同时认为史学与这一个神圣的任务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但是因为传统的历史思维与历史写作太过狭窄、太过陈旧了，不可能对新的时代有所启导，所以史学本身应该有一革命，以适应新的任务。新的史学应该写“国家”、“国民”，写“群”、“社会”。

一

诚如梁漱溟（1893—1988）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的：

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¹

在这里梁漱溟提到“国家”、“社会”是中国原来没有的观念。这一段回忆颇能说明清季的实况。就以“国家”的观念来说，近代学者曾经引述了一个故事，说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一位清朝官僚和一位英国贸易代表在广东对话，当英国贸易代表提到中国是一个“国家”时，清朝的官员显然不知其所云²。即使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清廷的一些大僚仍然不相信西方国家的数目可能超过两三个。到1872年，里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在《左传》英译本的前言中仍然提到，中国人不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167页。

2 Yü Ying-shih,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N.Y.: Walter de Gruyter, 1994, p. 155.



能明白他们只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中的一个¹。陈独秀（1879—1942）便回忆说，一直要到1901年八国联军之后他才了解到，原来世界上的人是以一国一国的方式存在：

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²

史家吕思勉（1884—1957）曾经回忆说，在1895年左右，人们并不知道“国土”二字怎么写³。这许许多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晚清人士常常挂在嘴边的“无国”之感，究竟是针对什么而说的。

晚清思想界中“无国”的感愤大抵可以分成两种：在革命派方面，主要是从种族主义的观点出发而得到无国的结论，他们抱怨过去两百多年间中国是被异族所窃据，看来有国，其实是“无国”。南社健将像柳亚子（1887—1958）等人便不断发出这类的浩叹⁴。国粹学派健将黄节（1873—1935）的史学名著《黄史》中，便反复开导他的读者，中国看似有国，但过去二百余年其实“无国”，因为“无国”，所以也“无史”。他说：

1 Yü Ying-shih,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N.Y.: Walter de Gruyter, 1994, p. 155.

2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3 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收在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第350页。

4 参见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34:3（1996），第1—18页。



黄史氏受四千年中国史而读之，则喟然叹曰：“久矣乎，中国之不国也，而何史之足云！”¹

另外一种“无国”的感叹，则是从现代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发出的，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朝廷”，没有“国家”，而对于这个现象批评得最为严厉，在建构现代意义的“国家”方面讨论得最多，对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应推梁启超²。

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戊戌前后他已不断提出这方面的论点；在政变失败流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政治思潮的影响，而另有发展。

梁启超是康有为（1858—1927）的学生，而康有为、谭嗣同（1865—1898）等人是反对“国”的。康氏《大同书》虽然完成于后来，不过梁启超等人早就读过它的草稿了。在破除“国界”方面，康有为的思想则前后一贯。他说“人患无国，而有国之害如此”³，主张“去国而世界合一之体”⁴，又说：

虽有仁人义士，不得不各私其国，故其心志所注，识见议论，皆为国所限，以争地杀人为合大义，以灭国屠人为有大功……世界人类终不能远猛兽强盗之心，是则有国乎，而欲人性止于至善，人道至于太平，其道相反，犹欲南辕而北其轍也。⁵

在这方面，梁启超很快便脱出其师之樊篱。他在1897年写的《说群自序》中已经有“无国”之叹。戊戌政变之后，梁氏流亡日本，他开始撰写一系列鼓吹国家思考的文字，反映了梁氏受到当时在日本非常流行的伯伦知理（J. C.

1 黄节：《黄史》，《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第1页。

2 参考胡适的回忆《四十自述》，台北世界文摘出版社，1974年，第59页。

3 康有为：《大同书》，台北龙田出版社，1979年，第2页。

4 同上书，第107页。

5 同上书，第102—103页。



Bluntschli, 1808-1881) 国家学说的影响。

日本在1890年代,思想上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即由以法国、英国为理想转向以德国为理想,这一个转向表现在思想、文化、政治等许多层面,而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是其中一例¹。梁氏一生写过许多文章介绍西方思想家,但是在数量上从未像介绍伯伦知理那么多,足见伯氏的国家思想在他心中的分量;这同时也标志着梁氏由崇拜卢梭到宣扬伯伦知理,由重人民到更重国家的一个微妙转变²。

这些鼓吹国家思想的文章中较为人知的有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此外还有1902年的几篇文章。1902年是梁启超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他创办《新民丛报》,而且写下了几篇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字,像《论国家思想》、《新民说》的一部分、《新史学》等。这些文章应该被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大多关心两个问题:“国家”及“国民”。梁氏在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中提到“国”字的定义是有土地、有人民,由居于其土地上的人民自治其所居的土地之事,自制其法律;尤其重要的是“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用这个标准来看,古代的中国虽有国之名,其实是“未成国之形”³。《论国家

1 Kenneth Pyle,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Massachusetts: D.C. Heath and Company, 1978, pp. 97-101.

2 可惜因为其中一些文字并未收入《饮冰室合集》,所以它的分量未被正确估计。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1:1(1971),第11-28页。另外,法国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一文,也讨论梁氏与伯伦知理的关系。该文刊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00期,第221-232页。

3 梁启超说:“欲斯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又说:“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首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他接着又说古代的人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名字:“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见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文集》第二册,第9-10页。



思想》是比较有系统地讨论“国家”思想的一篇文章，他说：

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¹

在这一篇文章中梁氏还提出国家的几个定义：首先是“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第二是“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朝廷只是公司之事务所，“夫事务所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为事务所而立乎？”“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蠹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此外是“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强调的是竞争之义，“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²。把“朝廷”与“国家”分开的观念，是他在《新史学》中反省旧史、开辟新史的一个重要凭藉。

梁氏一再强调，中国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的观念，而且因为没有“国家”观念，而常为外国人所嘲笑。他在1899年《清议报》第二十四册特地释译日本人尾崎行雄的一篇《论支那之命运》。文章的开头就一再批评中国没有“国家”：

1 梁启超：《论国家思想》，《饮冰室专集》第三册《新民说》，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第16页。

2 以上引文皆同前书，第16—18页；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第20页：“非有国而不爱，不名为国，故无所用其爱也。”（《饮冰室文集》，第十册）。《先秦政治思想史》，首章，第2页：“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其不能组织国家也亦可，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饮冰室专集》第二册）。

支那人未知有国家，安得有国家思想？¹

他认为这是一个至可羞耻的事，正因为没有国家思想，不知“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故人民一方面不知道自己是国家的拥有者，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为这个整体尽自己一份的力量，从而也就没有“爱国心”，当国家遇到外敌侵袭时，也就没有因为同属一个整体而兴起的同仇敌忾精神。这也是前面提到过的陈独秀所自惭的“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梁氏再三强调，有几种因素妨碍了“国家”思想之形成。首先是朝廷。中国几千年来因为“朝廷”观念的支配，人们只关心一家一姓之事，而没有全“国”的想法，所以也只注意于这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国家是一个整体，包括它所有的人民、物产、财力等等。贵族的力量当然也是阻碍国家思想形成之因素。此外，家族思想、地方主义等，凡是使人们囿于一地或一群人之见的，都是创造现代国家之时所要破除的。

梁启超有一种“自然”相对于“有意识”的思维：以朝廷、贵族、家族、乡土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是“自然”的状态，而组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有意识”建构的工作。这种建构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破除旧势力的作祟，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以各种方法凝聚人民，成为种种现代社群，最后凝成一个现代国家。

在这一方面，梁氏与严复（1853—1921），还有其他同时代的人，都多少受到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地位极高，而在中国又广被称颂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

1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第8页。